

新中国教育70年

白杰瑞¹著 郑雅君¹,巴力哈西·哈山²译

(1.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香港特别行政区;2.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本文回顾了中国教育系统70年来的变革和发展,涉及部分教育政策与实践、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未来的挑战和机遇。本文强调,中国教育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不仅应归功于体制系统,也建基于中国人民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学生对教育的热切期望,以及千家万户对教育的慷慨投入。

关键词:中国教育;发展成就;教育改革;机遇与挑战

DOI:10.13397/j.cnki.fef.2019.04.003

70 Years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in China

Gerard A. Postiglione¹

Translated by ZHENG Yajun¹, BALIHAXI Hashan²

(1.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including several selected policies and practice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an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the success is not only due to the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the value placed o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of students, and the investment of individual families.

Key words: China's Education; Achievements; Education Reform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一、问题与挑战

中国在教育发展上的突飞猛进可谓史无前例,以至于其他国家难以完全理解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复杂性、挑战与机遇。要理解这一议题,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和巨大的耐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年轻的多民族国家,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拥有业已传承千年的文明根基。(其他发源于西方文明的新生国家在教育领域达到与中国同等水平可能需要比70年更久的时间。)虽然当下面临的问题仍盘根错节,但依托着曾雄踞世界、绵延千年又素来重视教育的中华文明,中国教育体制至今仍能从其文明传统中汲取养分。对中国教育而言,一大难题是如何实现国内需求与国际接轨之间的平衡。

把控国内需求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各需求之间需

要维持一种细微的平衡。中国的教育系统是由一个正在变化的需求市场塑造的,市场主体的需求又依不同社会群体而不同。农村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希望孩子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与此同时,雇主也希望毕业生能够具有满足产业升级所需的知识储备和技术能力;城市中产阶层的影响力日渐增长,他们希望教育能够带来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自己的孩子能够处于优势地位;农村流动人口的需求是子女能够在城市上学,而留守儿童的需求则是希望当父母离家打工时乡镇能够提供教育服务。最终,国家希望教育能够成为助力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也把教育视作培育管理干部、推进意识形态的社会化、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通过培养能够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熔于一炉的高素质领导干部,国家成功地维持了社会稳定。

高技术需求、地位文化需求、社会稳定需求之间有所交叉,并且在不同的时期角逐着对教育改革的影响力。每一种需求在各个历史时期占据的优先次序可能不同。众多需求同时存在,中国市场也在根据每年经济增长程度、人民满意程度和中产阶级发育速度三类指标的变化进行再校准,社会的变革决定着这些需求的先后次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社会对实用技术的需求最高;在其他时期,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在优先考虑的范围内;在中产阶级扩张的阶段,为达到与文化资本的协同,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也会同时增长。教育结构和内容上的改革是由上述三种需求共同塑造的。

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难题是增加教育机会来维持多重维度上的平衡。中国不能仅仅在东部沿海富裕地区发展高质量教育,西部贫困地区也同样需要帮扶;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不能扼杀创新实践与创造性;必须保护传统文化,同时又要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念;在发扬主流文化资本的同时,也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生命力;在向国门之外的世界学习高新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引导年青一代看清楚全球化对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在保持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也要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已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中央政府仍旧制定国家层面的经济计划并指导地方政府出台实施方案。在教育方面,中国通常每五年会出台一次“五年计划”,不过间或也会出台更长期的发展规划,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该纲要与“科学技术计划”(2006-2020年)和“人才培养计划”(2010-2020年)共同作为宏观层面的发展框架起指导作用。

中央政府更希望地方政府能紧紧跟随这样的长期计划,但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灵活发挥其自主性的空间。地方政府有时会对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创新性的把控和试验,试验成功的情况下,这种试验方法也就会被推广到其他地区。此外,出于经济、文化等多重考量,地方政府若认为中央政府出台的教育政策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形,比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容易发生类似的情况,则会进行适当的调整。比起严格执行更高一级行政单位出台的政策,地方政府时常在本地区开展创新性探索。这种方式仅仅会在结果不理想或者完全与上一级行政单位出台政策相悖的情况下,才会给地方政府带来麻烦。反之,如若在地方政府的试

验下教育得到了发展,则可能会影响中央政府后续政策的审议。

中国已在发展本国教育系统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促进了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性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实现国际接轨与国内需求之间的平衡。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三项挑战。第一,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教育体制需要更加国际化、全球化;第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不希望全球化进程折损国家教育体制的权威性;第三,中国的学校,尤其是高校,需要更多的机构自治权。三项挑战中,同时解决任何两项都较容易。同时面临三项挑战则需要积累经验来达到彼此间的平衡。

中国在瞬息万变的世界格局中如何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去运转教育系统,对于全国的中小学、学院和大学而言意味着持续的改革。中国将教育定义为一个由学校、职业学校、专业学院和大学组成的整合的系统,称之为教育体制。1985年我还在北师大学习,5月30日那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是关于中国教育的第一次主要改革,即“教育体制改革”。基本而言,这场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场重要的教育改革。这项改革包含了以下内容:对于在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行立法;将半数高中学校改制为职业学校;在招生和招聘上给予高校更多自主权等。

戏剧性的改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层出不穷。每一场改革聚焦于教育体制整体,但又不失对教育体制各部分的影响。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旨在对职业技术教育进行重大改革;“十三五”计划也同样关注职业技术教育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该计划的实行下,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并下拨大量资源。此外,高考改革也催生了将600所省级大学转变为“应用型大学”的计划。

教育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中国政府精心制定的教育改革也向人们证明了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非凡:中国目前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大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涌现,并建立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202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1.2年(在2010年这一数字为9.6年)。

在这个技术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

中,中国经济若想更具竞争力,必须依赖创新创业。因此,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教育也是能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更有竞争力的计划之一,成为提供转型所需人力资本的关键一环。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中国在发展教育时,既面临着与其他国家相似的挑战,也需考量其本身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例如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如何提升劳动力技能。2006年,我和中国的一些年轻企业家进行了讨论,其中一位表示自己的公司在聘用大学毕业生时,希望他们能够具有公司所需的技能。这位企业家的公司——阿里巴巴后来成为世界领军企业,并且也在宣扬这样一种理念:高等教育需要时刻做好准备,为那些有望成为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创新型企业家的大学生提供他们所必需的多样化技能。

第二,中国如何让教育在经济重组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对教育体制的考验在于,何种因素能够将劳动密集型、低成本投入、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基于高新技术与服务且更加依赖国内消费的经济。世界一流大学则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但这也需要中小学、学院和大学(不论学术型还是职业型,不论公立还是私立)共同构成一个多元的系统,能够与各行各业齐心协力,共同为地方和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优质的职业技术学院和理工大学对于培养高技能人才以加强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至关重要。取得结构性的再平衡意味着国家要从制造型转向服务型,要从出口型转向国内消费型,要从盈余储蓄型转向吸引储蓄型,要从国家导向型转向基于市场的资源分配型。中国教育体制的成功也使中国可能免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大学要获得成功,只有依靠创新来解决其发展问题,如城市化、医保问题、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

第三,如何让教育在巩固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上发挥更多作用。中国用儒家教育传播道德价值观,以之作为建立传播现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体系的基础。学校作为一种组织,为一个社会维持着连贯性。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教育一直是一股保守力量,因为儒家强调对伦理进行钻研,而伦理道德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准。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儒家正统性也是科举制度的根基,而科举制度则代表着出人头地、为官入仕。虽然这一考试制度仍然向那些权贵家族倾斜,但它的确带来一定的公平性^[1]。尽管科举制度着力于培养高素质人才,但它同时对全社会范围内

识字率的提升也有巨大贡献^[2-3]。新中国的扫盲和基础教育推广工作与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教育并行不悖。

二、观点与立场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所卓越大学的教授,我本人对关于改善入学机会与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社会政策更感兴趣。我亲眼目睹了中国教育体系40年的发展。同时,作为一些国际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员,我的部分工作成果包含在向中国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和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我所进行的政策研究涉及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我的研究重点在于城乡学生、性别、民族之间在教育上的差异。

我亲历了邓小平在1978年带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新时期,当时学术标准也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重新得到重视。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的手段”。自邓小平执政以来,基础教育在中国得到了普及,上海中学生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在科学和数学方面领先于大约60个国家的中学生^[4]。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上海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全球排名第一的原因在于强大的教育体系和优秀的教师^[5]。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为国民提供了任何国家都无法匹敌的入学机会,还创建了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不过,虽然经济改革的确带来繁荣昌盛,但中国在扶贫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国家在教育方面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在于,不论城乡、阶层、民族、性别、身体、智力、能力上的差别,中国教育能否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中国政府已在一个人口数量超过十亿的国家中,将九年义务教育在适龄读书儿童中的普及率提升到了95%^[6]。

接下来,中国所要做的就是提升教育质量。

随着经济指标在这个奉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迅速攀升,生活质量成为民众的优先考虑,而教育则是提升生活质量的保证。虽然教育机会急速扩张,一些社会群体仍比另一些群体获得了更多益处。中国继续普及基础教育并降低文盲率,在新兴劳动力市场扩大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大学入学率以加强知识经济。只有依靠更多元的教育体系,中国才能满足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女性与少数民族应获得更多的社会机会与受教育机会。然而目前,要建立一支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职业技能的女性少数民族劳动力队伍,仍需进一步提升其毕业后的就业机会。

我花了很多年在很多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对基础教育对于扶贫工作的作用进行政策研究。城乡之间的差异通常是最明显的特征。例如,在城市中,女学生的成绩平均要比男学生好,但在乡镇中则相反^[6]。城乡差异也反映在教育系统的结构上。比起农村的孩子,城市里的学生有更大的机会获得三年的学前教育(其中最后一年为幼儿园)。不过,目前中国正在向乡镇投资,发展乡镇的学前教育。学前教育的内容涉及汉字的书写和歌舞游戏等,并向儿童展示美与善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可以接受学前教育。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外来人口3-5岁的子女中,也只有60%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6,7]。因此,许多外出打工的父母会选择将孩子留在家中,成为留守儿童。

城市里的孩子到6岁时,会就近选择上六年制的小学。对很多中国孩子来说,课业繁重且耗时漫长,对于女生而言可能还要加上家务负担。一名重庆女高中生可能会早上6:30左右起床,然后在去学校的路上吃早餐。在完成一天的课程后,下午4:40开始上第一节晚自习,然后在6:30上第二节晚自习,这期间她的父母会把晚餐送到学校来。上完晚自习回家后,她还得写完作业,能睡觉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

中国也在提升农村女生的教育质量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女性文盲率从1990年的32%急剧下跌,到了2000年只剩13%^[8],到2017年时,这一数据只有7%了^[9]。整体而言,适龄儿童进入小学读书,这在男孩与女孩之间基本已无差别,但农村女孩的出勤率较低,辍学率也较高。过去在农村里,先在农村念两到三年小学,再转到镇上的小学读完剩下的部分,这样的现象很常见。等到上初中时,又会转入县里的初中住校读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中国有近一半的学生会进入中专学校就读。

此外,在农村教育与扶贫工作方面还存在一个问题。虽然九年义务教育有立法保障,但在2006年之前,有些农村孩子会因为额外的学杂费无缘入学。的确,随着教育成本上升,许多家庭会难以负担教育支出。但自2007年起,中国各级政府共同努力,开始为学校提供资金,并出台政策避免学校收取过高费用。教育方面的金融改革也为贫困农村地区的学校带来资金,也为那里的学生们带来了免费教科书。农村地区不再缺乏教育所需的基本条件,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学校设施都得到了改善。

尽管教师的资历和待遇都在提升,但对农村地区而言,留住好老师非常难。虽然一些偏远地区也拥有

优质的师资、新建的学校、良好的设施甚至图书馆,但教育资源缺乏的情况在很多地区依然存在。实现更均衡的发展仍是重中之重,辍学问题在农村更为严重,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浙江和江苏等东部沿海省份的辍学率较低。在城市中,由于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女孩在教育上被重视的程度与男孩并无二致。东部16个省份的儿童入学率接近100%^[10],但西北与西南的省份与此相比仍有差距。不过,近些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这些地区的入学率和注册人数得到了稳定的发展。中国政府在农村教育的建设上斥资150亿元,以期降低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实现中国西部372个县的“两基”(扫盲和基础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未来十年,中国教育体系中起关键作用的部分将是高等教育。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已经或正在走向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化阶段。许多国家的人才举措都将建设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作为重点。STEM领域也逐渐在全球高等教育中占据更重要的席位。大学课程也越来越突出文科和理科课程的重要性,以培育软技能、促进创新。职业技术教育也逐渐渗透到各级高等教育,所采取的办学形式也多种多样。大学与工业界及社会公私部门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对于大学保持稳健的经费支持而言也越来越重要。随着高等教育系统更深地嵌入社会中,大学治理已越来越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跨国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已经成为优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等教育入学必须基于公平性与公正性,人们也越来越希望教育系统和机构能够具有高度的内外部效率。高水平大学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机构自治权。大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从出现到现在用于商业目的,再到成为有助于大学管理成果、财务以及人力资源的工具。

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想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更加国际化,更具跨学科特性,更具包容性、创新性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大学此前从未被视为国力竞争的工具,也未曾成为促进世界稳定与和平的途径。习近平主席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将其体现在他的两个指导方针^[11]里:(1)大学应担负起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建设更加公正合理世界秩序的责任;(2)大学应担负起引领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的责任。

三、中国教育成就的基础

中国在过去7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大众运动、为建设新国家和新的

教育体系付出的巨大努力,既通晓传统文化又兼容现代性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在中国语境下的适应能力、一个大力倡导扶贫扫盲和全民致富的政府、不断更迭的全球秩序、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经济,以及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中国与世界能够更便捷地进行沟通和合作。

过去的70年中,对中国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一大转折点是“五四运动”——它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反对皇权统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主导国际社会的几个国家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使中国成为扩张主义势力的受害者。青年们在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在政治和文化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四运动激起了爱国主义的热潮,为中国铺平了科学民主发展的道路。经过许多世纪的朝代更替,中国终于找到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入的全新发展道路。这一时期,青年领导者层出不穷,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例,他们的事业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梁漱溟、章炳麟、周作人等人也在西方思想喧鸣的时刻提出保持中国传统不被消除的方法。林语堂、余英时等人也紧随他们之后。

教育在过去的70年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拥有悠久且复杂历史的国家而言,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一个新的教育体系免不了许多艰难。对新中国的建立影响最大的文化基础在于这样一个信念:一个伟大的国家只要建立起植根于自身文化根基的教育体系,就会实现民族的复兴。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可以在中国的书院中找到,中式书院的出现早于西方被视作神圣的四个高等教育机构——博洛尼亚、牛津、剑桥和索邦。

中国的学院融合了孔孟之道、孙墨之法,以及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朱熹、王阳明等人的思想。现代教育思想家们也发现扫盲的重要性,并努力寻求将传统教育理念融入现代话语中的新途径。这其中包括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晏阳初、梅贻琦、江柏霖、严复、陶行知和潘光旦等人。

在他们的影响下,革命时期也成就了当代的一批教育思想家。如,顾明远、黄济、李炳德、鲁洁、潘懋元和王凤仙等。这些中国思想家抓住了中国教育思想没有充分受到本土思想影响的疑虑,去思考中国教育如何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互动。像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理解英、德、法三国高等教育传统后,思考了如何把这些特征与中国儒家思想和其他文化脉络熔于一炉、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

40年前我到中国时,85%的中国人都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然而到了2019年,这一数据变为1%以下。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走到了世界前列。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对义务教育完成立法后,我也曾到过老、少、边、穷地区,考察当地的学校和家庭的情况。我参与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发展部和亚洲开发银行发起的政策研究。到了20世纪末,中国大部分乡村都已普及九年基础教育,且大多数城市里的孩子能读完高中。在1981年,很少有年轻人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只占总体比例的2%左右,但1998年以后,高等教育机会得到了快速增长。

中国肩上的责任是艰巨的,因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体量上是世界范围内最为庞大的。中国是世界上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且留学生数量位列世界第三。1998年,当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指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时,我也在场。政府大力投资“985”“211”和“双一流”高校,以期中国的顶尖大学能够有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排名。至2020年,中国会有多所高校进入世界排名前100位,且高校入学率达50%。

中国还很年轻,中国的教育体系也还很年轻。但在70年的发展中,中国摆脱贫穷走向强盛,中国的教育体系也从平庸发展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模范。这些辉煌成就无不依靠中央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地方自下而上的试验方式、不同地区根据自身特色实施变通政策,以及国家、区域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既取得了如此成就,中国的发展战略可以不必再如贫穷国家了。对教育而言,这意味着为自己的人民提供公平、公正、高质量且多样化的教育。现在是中国通盘回顾、展望其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好时机。仍然存在很多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创造性思维和创新型领导力的进一步发展上。

过去40年,特别是从1999年到现在的20年间,中国教育体系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高度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计划,有了这些计划才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高等教育领域的就业机会与教师待遇也得到了迅速提升。随着教育水平提高,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将需要新的教育治理模式。中国的顶尖大学需要更多的机构自治权以建设创新型国家。新的改革可以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及“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协同联动。

中国在教育上的成就,将继续依赖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的改革开放:促进农村学前教育的扩张;九年

义务教育中努力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让每家每户更加认识到职业技术学院发展的重要性;改革大学教育向更高质量、更与国际接轨的方向发展;为人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

四、新的问题

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我认为中国教育系统仍然会面临许多挑战。中国既需要在巩固民族团结的同时兼顾多民族国家日益增强的多元性,又需要为每个学生创造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打开获得国家主流知识与技能、就业与财富的大门;中国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需要减少各区域和社会群体之间在入学机会方面的不公平。而这些挑战又会因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

自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新生儿出生人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14岁以下儿童人口从1975年的3.6亿减少到了2010年的2.5亿,并将持续减少直至2020年^[2]。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补充劳动力市场缺口的年轻人也在减少。教育系统的发展必须加快,受教育的人口也必须增加。中国的年轻人如果不能适应这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将对中国的发展毫无益处,因为低技能工作虽然撑起了中国的崛起,但也正随着时代潮流走向没落。高等教育的扩张只有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合拍,才会促进中国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要想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就需要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在1965年就扩张到了600万,1985年达到1200万,2015年这一数据又上升到了2000万^[3]。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65年的10%上升到了2017年的34%,这对于美国经济的大繁荣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自1998年起也迈上了这一条轨道。2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取得了高校入学率达50%的成就(大约3500万人),甚至在主要大城市中,高等教育几乎全民普及。人们期望,大学能够通过促进创新发展来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许多外国学者对中国民办教育的兴起较为感兴趣。2012年到2016年,中国民办高校的总收入从696亿元上升到了954亿元,占据中国高等教育总收入的9.6%,预计未来能够达到1390亿元^[4];本科在校大学生人数从2012年的530万上升为2016年的620万,占据受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数的约五分之一,预计到2021年能够达到760万^[4]。平均每个民办学院都有约1万名在校学生(多于民办大专院

校),有的甚至更多。例如,江西科技学院有3.5万名在校学生。

身处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各国建立和发展教育体系的目标、途径和方法各不相同。而教育发展政策是根据国家的战略优先次序和经济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如果我们进行国际比较,各国的差异性就显露无疑了。例如,在一些国家,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差异突出且显著;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二者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各国也会根据特定的环境和限制来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各国教育系统从未如今天这般同构。随着经济全球化,教育机构必须把学生塑造成掌握专业技能、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力提升的人才。但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模式和文化传统同样至关重要,它们会带来路径依赖。

20世纪下半叶,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借鉴其他国家的教育政策。但并不是所有政策借鉴都能成功,这是一种极有风险的尝试。杜克大学的一项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把学生贷款政策从美国引入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策上的失败,但由于地方政府进行了种种试验,这项政策最终化险为夷”^[5]。成功借鉴他国政策必须理解政策来源国的本土经验。

政策借鉴与转移有五种形式:照抄、效仿、杂糅、融合、激发新灵感。通常而言,最可取的政策制定方式是针对特殊情况调整借鉴的政策,或结合在多地实施的多个政策。成功的政策借鉴与成功的技术转移有诸多共性:(1)找到特定的挑战和困难;(2)对已有成功的国际案例进行研究;(3)考虑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对选定的政策或技术进行调整;(4)通过系统性的实施战略进行试验;(5)对政策或技术的有用性和适用性进行评估;(6)对政策或技术进行再调整与进一步改造;(7)下一轮的试验;(8)确定政策或技术的使用;(9)进一步根据本地情况调整政策或技术。

政策的转移也不一定立竿见影,但却需要决策者愿意尝试、敢于冒险。借鉴他国政策需要了解相关信息,借鉴要充分且适当。此外,还需要借鉴方了解清楚政策来源地实施该政策时的成功或失败经历。中国在历史上借鉴过很多其他国家的政策。1950年,中国从苏联借鉴了计划经济体制,确保政府各部门及其学校和技术部门之间的紧密联合。自1978年起引入市场的力量,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普通高等教育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此外,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整个过程中,中国

也研究了加拿大和美国等许多国家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政策实践。

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时代,生产价值更高的产品需要更加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技能。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产业界对知识技能有着新的需求,而家庭对于就业和更好薪资待遇的需求也有所提升。为了将劳动密集型、低成本投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转型为基于高新技术与服务且更加依赖国内消费的经济,中国的教育体系需要培养能促进这一转型的劳动力技能。在这方面,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制定一个能在全中国范围内提升教育系统各部分联动性的政策。从国家层面上看,中国政府已经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并颁布相关政策,力图拓宽学校、学院和大学提供的各类教育的多元化程度。

五、愿景

中国教育的未来,将取决于其教育系统响应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全球互联趋势的程度,也取决于所有教育机构不忘使命、保持市场灵活性和财务稳健性的程度。牢记使命意味着教育机构对其所服务的社群所要创造的价值坚持;高度的市场灵活性要求教育机构通过增值服务来更好地与市场合作,而不是由市场决定其价值;而高度的财务稳健性则要求教育机构在做财务决定时,要基于其使命与价值进行深思熟虑,而不是“拍脑袋”决定或因上头传达才做决定。

中国的未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能创造一个独特的、有借鉴价值的教育模式,为众多“一带一路”国家建设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加健康有素的人力资源以及更加安全公平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CHANG C L. Merit vs. Money[G]// JOHANNA M M.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Lexington: D. C. Health and Company, 1963: 22- 27.

- [2]ELMAN B A, WOODSIDE A.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 1900 [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3]LEE T H C.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 [M]. Leiden: Brill, 2000.
- [4]OECD. PISA 2009 Results [EB/OL]. [2019- 06- 20]. <https://www.oecd.org/pisa/pisaproducts/46619703.pdf>.
- [5]LIANG X. How Shanghai Does It: Insights and Lessons from the Highest-Ranking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World [M].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6.
- [6]OECD. Education in China: A Snapshot[M]. Paris: OECD, 2016.
- [7]ZHANG F, ZHAO S. Ensure equal access to preschool education[G]// YANG D. Chinese Researcher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Leiden: Brill Press, 2019: 122- 138.
- [8]赵珊. 中国为世界扫盲做出贡献[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7- 08- 01 (01).
- [9]国家统计局.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 [10]ZHANG T, LI K, HU H.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tra-Reg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G]//YANG D. Chinese Researcher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Leiden: Brill Press, 2013: 93- 109.
- [11]张国威. 习首提2个引导,展领导世界雄心[N]. 旺报, 2017- 02- 22.
- [12]World Population Review. China Population 2019 [EB/OL]. (2019- 07- 12) [2019- 07- 26].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china-population/>.
- [13]GOLDIN C, KATZ L.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4]YU K.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es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J].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8 (95): 21- 23.
- [15]ZHANG H. Student Loan Defaults in China and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2016.

收稿日期:2019- 07- 22

作者简介:白杰瑞(Gerard A. Postiglione),美国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荣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和东亚的教育发展与社会公平。
译者简介:郑雅君,甘肃张掖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与教育公平;巴力哈西·哈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